

央地政策沟通对边疆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央地政府工作报告的相似度

余迎一

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经济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4;

摘要: 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是破解边疆地区发展瓶颈、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关键。本文以 2003-2019 年边疆地区地级市为研究样本, 通过文本分析法测算边疆地级市政府与中央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相似度, 以此衡量央地政策沟通水平, 然后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边疆地区资源错配程度, 最后通过实证研究央地政策沟通对边疆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央地政策沟通与边疆地区资源错配程度呈显著正 U 型非线性关系, 并且存在最优政策沟通水平 0.6977, 低于该水平时, 政策沟通强度提升可缓解资源错配程度, 超过该水平后政策沟通强度提升会加剧资源错配程度, 基础设施建设在其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 基础设施建设程度高的边疆地区, 政策沟通强度对资源错配的缓解效应更突出, 表明央地政策沟通可精准对接边疆基础设施需求、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来缓解资源错配程度。本文的研究为优化边疆地区央地政策沟通机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关键词: U 型; 政策沟通; 资源错配; 边疆

DOI: 10.64216/3080-1486.25.12.029

引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 12 月 9 日就我国历史上的边疆治理开展第十八次集体学习, 全面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边疆治理的历史性成就与变革, 总书记明确指出, 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既有研究亦表明, 在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进程中, 边疆地区可充分发挥内引外联的区位、制度、生态、资源、文化五大优势, 在统筹发展与安全中推进现代化。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 区域发展不平衡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瓶颈。边疆地区受经济基础薄弱、市场机制不完善制约, 资源配置效率亟待提升: 资本因基础设施滞后、产业链不完整难以精准流向高效领域; 劳动力市场面临“人才外流”与技能型人才短缺双重困境, 人力资源效用未充分释放; 技术创新因产业链协同不足、长期依赖资源型产业, 难以实现高效转化与应用。破解这一结构性矛盾, 关键在于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深化东中西部产业协作”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战略部署。此过程中, 边疆地区地级市与中央的政策沟通尤为重要: 中央制定的产业引导、财政扶持等宏观政策需精准对接边疆实际需求, 边疆地区地级市亦需及时向中央反馈本地资源禀赋、发展困境等一手信息, 为中央政策调整完善提供依据。这种双向政策沟通, 一方面可通过中央统一政策规划与财政补贴, 提升资本、技术等要素在边疆地区的合理流动性; 另一方面能以政策引导推动边疆产业结构从资源依赖型向

创新驱动型升级。在此背景下, 边疆地区地级市与中央通过政策沟通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成为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关键切入点。

基于此, 本研究以边疆地区为对象, 通过量化边疆地级市与中央的政策沟通水平及边疆地级市资源错配程度, 探究二者因果关系并揭示其影响机制, 旨在为优化边疆地区要素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

1 文献综述

1.1 城市资源配置效率的文献研究

目前, 国内外学者对缓解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有较多研究, 涉及产业聚集、产业转型、外商投资及政府行为等方面。

产业聚集方面, 季书涵等 (2016) 测算不同行业资源配置效率指数, 发现我国多数行业存在资本配置不足、劳动力配置过剩问题^[1]; 崔书会等 (2019) 采用差分 GMM 研究产业协同聚集的滞后影响, 异质性分析显示其对我国区域的影响差异明显^[2]。产业转型方面, 张建华和邻凤明 (2015) 指出资源配置效率会通过影响金融体系致金融扭曲、作用于产业部门进而影响经济增长^[3]; 曹玉书和楼东玮 (2012) 发现结构转型可缓解资源配置效率, 以推动我国经济转型^[4]。外商投资方面, 白俊红和刘宇英 (2018) 研究发现,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不同地区影响不同且存在路径依赖^[5]; 刘会政和李雪 (2022) 通过准自然实验发现, 放松外资管制对国企、外资企业

影响不显著,对民企则能缓解强竞争力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加剧弱竞争力企业的,根源是民企两极分化^[6]。政府行为方面,孟辉和白雪洁(2017)基于H&K模型测算中国光电产业资源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发现该产业资源配置扭曲严重,地方政府雷同产业培育竞赛及不当投资激励是主因^[7];江艇等(2018)从城市行政级别视角发现,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越差,此效应集中于国企、外资及港澳台企业,对民企则有改善作用^[8]。

1.2 边疆地区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文献研究

本文将边疆地区视为客观整体展开考察,并非局限于区域视角,而是融合其在地理位置与环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别于内地的多元特征,且具备相应理论支撑。牛德林(1993)以沿边9个省区构成的陆地边疆为边疆经济考察对象,提出将边疆与区域有机整合为统一体,以此揭示中国陆地边疆经济发展的特点与规律^[9];李光辉(2022)构建边疆经济学五大理论,涵盖边疆区位再造理论、非经济要素整合理论、区域经济联动理论、边疆经济国际合作带理论、平台辐射引领理论,其中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理论提出,边疆地区具备良好联动发展条件,可作为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协同合作的特殊联合体,通过与不同区域开展资源整合、实现优势互补,构建完善的区域合作机制^[10]。同时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边疆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低于沿海地区。韩剑、郑秋铃(2014)基于Hsieh and Klenow模型,将资源错配测算拓展至行业间层面,对比中国各地区资源错配程度后发现,中西部地区资源错配程度显著高于东部地区^[11];白俊红、刘宇英(2018)研究表明,中、西部地区多数省份劳动力错配程度较轻,但资本错配问题突出^[12]。

1.3 关于政策沟通的文献研究

关于政策沟通有效性,多数观点认为其效果与地方官员竞争存在关联,且这种竞争往往直接造成政策沟通效率偏低。刘伟(2014)指出,在政策纵向传递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对上级出台的政策往往仅进行细微、机械的调整,未充分考量中央与地方在实际所处环境及面临约束条件上的差异,这一做法影响了政策沟通的实际效果^[13]。王美今等人(2010)通过研究,综合识别出我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中存在的“横向策略互动”与“纵向共同反应”两种行为模式,进而发现特定政策场景下“兄弟竞争”(地方间竞争)与“父子争议”(央地间分歧)的现象同时存在,地方政府的区域性竞争行为及对中央政策反应不足的行为特征,正是导致政策沟通效力弱化的直接原因^[14]。

1.4 关于政策沟通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文献研究

现有研究普遍认可政府政策对城市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影响。陈云贤(2019)构建的“三类资源配置框架”提出,政府在准经营性资源领域可通过“政府推动+企业参与+市场运作”机制激活城市基础设施经济价值,深圳即借助该模式实现资源生成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发展^[15];钱文荣(2001)指出,中国城市土地配置长期受“市场失灵”与“政府缺陷”双重制约,虽需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但政府机制仍具有关键作用,且需通过有效措施弥补政府缺陷^[16];倪婷婷等(2022)针对撤县设区的研究表明,行政整合可通过破除市县壁垒、提升要素价格显著优化资本配置效率,然而劳动力配置仍受户籍制度限制^[17];张莉等(2017)关注区域差异发现,东部高级别城市对中央重点产业政策的响应更为积极,工业用地优先配置于“央地共认”的大型项目并形成“示范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因信息不对称易出现政策执行偏差^[18]。在现行“上传下达”的行政管理模式下,政策因素要发挥效力,需以政策文本为载体,历经“传达—学习—执行—评价”的政策沟通过程。尽管政策沟通对政策效力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但目前尚无文献对其影响机制展开系统、定量的考察。因此,从政策文本切入,分析地方政府如何通过政策沟通将中央和地方政策落实到资源配置实践中,可为更精准理解政策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提供直击本质的分析视角。

2 理论基础及影响机制

2.1 政府间政策沟通

本文以政府工作报告为研究对象,量化边疆地级市政府与中央的政策沟通水平。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政府施政纲领,涵盖过往工作回顾与未来工作规划,是理解大政方针及政府自身建设改革的核心文件^[19],兼具法定效力与政策性、权威性、纲领性特征,既是各级政府资源配置的指导依据^[20],也反映决策者对政府职能重要性的认知并明确发展方向^[21],属于中国政策沟通的重要形式^[22]。在研究方法选择上,文本分析法为政府工作报告研究提供有效路径,诸多学者成果已证实其适用性。既有研究中,Christine Ryan等指出政府工作报告可披露政府运作信息^[23];Rule等运用文本分析法研究美国历年国情咨文,梳理出美国政府政治语言演变轨迹^[24]。国内研究方面,文宏、赵晓伟(2015)通过文本分析2007—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测量政府部门对基本公共服务各领域的注意力水平,证实政府注意力配置对决策的重要影响^[25];卢盛峰、李晓淳和卢洪友(2020)采用余弦相似度法测算各市与所在省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平均相似度,发现市政府与上级政府工作报告文本相似度较高,反映地方政府积极落实上级政策^[26]。综上,国内外政策文本研究多聚焦文本内容分析,以此解读政府注

意力与行为动态。鉴于政府工作报告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政府整体政策规划,本文通过测算边疆地级市与中央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相似度,衡量二者间的政策沟通水平。

2.2 委托代理理论

在权责分离的治理结构中,信息不对称与目标差异易导致委托—代理关系下的激励失衡、信息隐藏及执行扭曲问题。在中国高度层级化的行政体系中,政策传导呈自上而下特征:中央制定宏观战略,地方负责落地执行,二者间的政策沟通水平构成关键“桥梁”,直接影响政策实施精准度与地方资源配置效率。当政策沟通水平较低时,信息不对称问题凸显:地方对中央政策意图理解不充分,中央亦难以及时掌握地方经济运行实情,进而引发政策执行偏差与失衡。随着政策沟通水平提升,中央与地方在政策目标、发展路径及资金安排等方面的认知趋于一致,沟通机制完善可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增强政策执行的协调性与一致性。但若政策沟通水平持续升高至过高度,地方易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中过度依赖中央,导致自身自主判断能力与治理创新空间受限,忽视本地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及发展阶段差异,资源错配程度反而上升。

2.3 基础设施建设

央地政策沟通通过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到地方资源错配程度。边疆地级市通过政策沟通向中央传递沿边口岸跨境公路衔接需求、内陆县域农村公路覆盖缺口等差异化诉求;中央则基于此类一手信息,将“兴边富民”交通专项计划等宏观基建政策与地方实际需求深度结合,同时通过政策沟通协调财政转移支付倾斜、简化项目审批流程,保障公路里程精准落地,避免盲目新建或需求错配。从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机制来看,公路里程的合理增加作为资源错配的“缓解剂”,可针对性破除边疆地区要素流动的“空间壁垒”:一方面通过降低物流成本,引导资本流向跨境电商、特色农产品加工等高效领域,缓解资本错配;另一方面通过改善跨区域通勤条件,减少“人才外流”并促进劳动力技能与岗位匹配,缓解劳动力错配;同时通过衔接产业链上下游空间布局,加速技术向生产一线渗透,提升技术配置效率。

因此我们提出假说:

假说 1: 政策执行对互动程度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应当是非线性的,存在介于 0 和 1 之间的最优政策沟通水平,使得政策沟通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效力最大。

假说 2: 基础设施建设发挥重要调节作用。

3 数据与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定

中央政府制订政策并通过政策文本传递给各级地方政府时,往往要求地方政府实现两个政策执行目标:既与中央执政方针保持一致(求同),又要因地制宜地开展地方工作(存异)。这就决定了,各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时极可能存在介于 0 与 1 之间的一个最优政策执行度。为检验这一最优执行度,本文建立了如下参数回归模型:

$$dist_{it} = \alpha_0 + \alpha_1 YD_{it}^2 + \alpha_2 YD_{it} + \alpha_3 \sum_i X_{it} + \mu_{it} + \lambda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dist_{it}$ 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地级市 i 在年份 t 的资源错配程度; YD_{it} 为解释变量,是地级市 i 在年份 t 与中央政府政策沟通指标; X_{it} 为可能影响城市资源错配程度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λ_{i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μ_{it} 表示城市固定效应; ε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模型估计时在年份和地级市层面对标准误进行聚类。

3.2 数据来源与指标构建

3.2.1 资源错配程度

参考刘诚、夏长杰(2023)^[27]的研究,本文选取了如下步骤来测算投资效率:设定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 生产函数)并取对数,得到 $\ln Y_{it} = c + \alpha \ln K_{it} + \beta \ln L_{it} + \varepsilon_{it}$,其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分别为 $\alpha Y_{it}/K_{it}$, $\beta Y_{it}/L_{it}$ 。假设资本价格为 r 、劳动价格为 ω ,根据要素边际产出与其价格的偏离来测算市场扭曲,分别为 $distK_{it} = |\alpha Y_{it}/r_{it}K_{it} - 1|$, $distL_{it} = |\beta Y_{it}/\omega_{it}L_{it} - 1|$,并综合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的扭曲,得到总的市场扭曲程度:

$$dist_{it} = distK_{it}^{\alpha+\beta} distL_{it}^{\alpha+\beta} \quad (2)$$

其中, Y 使用地区生产总值 GDP 测算; K 为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 L 为劳动力数量,使用各城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来测算; r 为资本价格,将其设定为 10%,代表 5% 的折旧率和 5% 的实际利率; ω 为劳动价格,用各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表示;资本产出弹性 α 和劳动产出弹性 β ,根据 C-D 生产函数做回归得到。

3.2.2 央地政策沟通

我们利用中央和地级市之间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相似度来代表央地政策沟通。本文从中央政府以及所有地级市的政府网站上下载了自 2003 到 2019 年的所有可查询完整的政府工作报告 1106 份;其中,中央政府工作报告 17 份,边疆地区市级政府工作报告 1089 份。

首先需对原始文本执行分词操作,完成这一步骤后,还需将得到的分词结果进行结构化转换,最终形成机器可解读的词频矩阵。目前主流的词频矩阵主要包括 TF 型、TF01 型与 TF-IDF 型三类,它们的核心侧重点存在

差异：TF 型聚焦词语在文本中“是否被重点突出”，TF 01 型关注词语“是否在文本中出现”，TF-IDF 型则着重识别词语“是否具有特殊性”。从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特点来看，各级政府为了凸显关键信息，往往会对特定词语进行反复表述，以此强化重视程度。基于这一特征，注重词语“是否被重点突出”的 TF 型词频矩阵，相比仅判断词语“是否出现”的 TF01 型词频矩阵，更能贴合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属性。再看 TF-IDF 型词频矩阵，其核心逻辑是突出文本中的“特殊词语”——对于仅在单一文本中出现的特殊词汇，它会赋予较高权重；而对于在所有文本中普遍存在的通用词汇，则会赋予低权重，甚至零权重。但我国政府工作报告具有极强的内容规范性与行文统一性，通用词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表意角色，若使用会忽视通用词汇的 TF-IDF 型词频矩阵，显然无法准确描述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特征。综合上述对不同类型词频矩阵的适配性分析，本文最终决定采用 TF 型结构来构建适用于政府工作报告的词频矩阵。

因此借鉴 Hobergand Phillips (2011)^[28]的做法，本文采用同一时期中央与地级市词频向量的类余弦夹

角值作为这二者政策文本相似度的衡量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YD_{it} = \frac{\vec{V}_{it} \cdot \vec{V}_{gt}}{|\vec{V}_{it}| |\vec{V}_{gt}|}$$

(3)

其中， YD_{it} 代表 t 年 i 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政府工作报告的相似度，以地方政府工作报告词频向量 \vec{V}_{it} 与中央政府工作报告词频向量 \vec{V}_{gt} 所构成的夹角余弦来度量，其取值在 $[0, 1]$ 之间；等式右侧的分子为 \vec{V}_{it} 和 \vec{V}_{gt} 的点积，而分母则为二者模长 $|\vec{V}_{it}|$ 、 $|\vec{V}_{gt}|$ 的乘积。 YD_{it} 越大， t 年 i 地级市与中央的政策沟通指标就越高。

3. 2. 3 控制变量

参考刘诚、夏长杰 (2023) 研究^[27]，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一系列可能会影响资源错配程度的特征变量，包括①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gdp) 取对数；②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loans) 取对数；③年末总人口 (peo) 取对数；④第三产业占比 (industry) 取对数；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sales) 取对数。上述城市层面的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表 1 报告了本文实证用到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dist _{it}	1089	1.3922	0.7544	0.0239	5.1118
YD _{it}	1089	0.7319	0.0483	0.5538	0.8681
gdp	1089	10.2103	0.7851	7.9662	12.4563
loans	1089	6.2765	1.1858	3.4949	9.7900
peo	1089	5.5162	0.6797	2.7954	6.9029
industry	1089	0.3864	0.0941	0.1105	0.6867
sales	1089	5.3911	1.1520	2.0252	8.4198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本文式 (1) 基准方程设定，就央地政策沟通对资源错配程度的影响展开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4. 1 基准回归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YD _{it}	-39.2979*** (10.6016)	-16.2778** (6.5180)	-14.1549** (6.0283)
YD _{it} ²	26.5983*** (7.3077)	11.3506** (4.5687)	10.1432** (4.2349)
常数项	15.8443*** (3.8356)	7.1993*** (2.3307)	4.2507 (5.1036)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城市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Adj.R ²	0.0125	0.7688	0.7830
观测值	1089	1089	1089

由回归结果可知，无论是否控制其他控制变量或者城市一时间固定效应，央地政策沟通对资源错配程度均存在显著的正 U 型非线性影响，验证假说 1 成立。表明存在一个介于 0. 5538-0. 8681 区间的最优政策沟通水平

0. 6977，当政策沟通水平低于该阈值时，随着政策沟通水平提升，资源错配程度下降，但超过阈值后，政策沟通水平提升会导致资源错配程度上升。

4. 2 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4.2.1 U 型检验

为了进一步严谨地检验这种倒 U 型关系的存在，本文采用 Lind&Mehlum (2010) 的三个步骤来进行论证^[29]，在表 2 的 (1) — (3) 类的回归基础上做 utest 检验，得到表 3 结果如下：(1) α_2 系数均显著大于 0；(2) 相

应拟合曲线左端点处的斜率值均小于 0，右端点处的斜率值均大于 0，符合正 U 型特征；(3) 顶点的横坐标 ($-\alpha_1/2\alpha_2$) 处于 0.5538—0.8681 之间，均在 YD_{it} 上下界区间范围内，进一步地，其相应的 95% 置信区间也在 YD_{it} 的上下界区间范围内。

表 3 Utest 检验

		(1)	(2)	(3)
正 U 型非线性检验	顶点	0.7387	0.7170	0.6977
	顶点 95% 置信区间	[0.7212,0.7677]	[0.6461,0.8104]	[0.5668,0.7809]
	左端点斜率	-3.8173	-3.7056	-2.0369
	右端点斜率	3.2032	3.4310	2.3457

与此同时，在表 2 第 (2)、(3) 列的基础上，还加入 YD_{it} 的三次项进行回归，如下表 4，发现三次项不显

著，且模型的拟合优度并没有提升，可见央地政策沟通与资源错配程度之间的关系是正 U 型而非 S 型。

表 4 加入三次项回归

	(1)	(2)
YD_{it}	-109.47 (80.27)	-128.92 (77.87)
YD_{it}^2	141.65 (113.82)	170.62 (110.00)
YD_{it}^3	-60.45 (53.62)	-74.45 (51.60)
控制变量	否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Adj.R ²	0.7689	0.7833
观测值	1089	1089

4.2.2 顶点两侧双线检验

进一步地，在表 2 第 (2)、(3) 列的基础上，借鉴

Aghionetal. (2005) 和 Swaabetal. (2014) 在顶点两侧进行双线检验^{[30][31]}，见表 4，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倒 U 型关系的存在。

表 5 顶点两侧双线检验

	(1)	(2)
x_low	-2.1961** (0.8821)	-1.7003** (0.8346)
x_high	1.1067* (0.6811)	1.4439** (0.7160)
常数项	1.3298*** (0.0288)	-0.6706 (4.6402)
控制变量	否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Adj.R ²	0.8341	0.7838
观测值	1089	1089

4.2.3 其他稳健性检验

前文提到在计算文本相似度时，更适合使用 TF 方法计算，这里我们使用另外一种常见的方法 TF-IDF 来

计算文本相似度，结果如表 6 所示，与基准结果得到的结论相同，解释变量的测度方法并没有影响到本文的论证。

表 6 更换解释变量测度方法

变量	基准回归		
	(1)	(2)	(3)
YD _{it}	-29.5877***	-12.7693**	-10.9336**
YD _{it} ²	21.5578***	9.6769**	8.5592**
常数项	11.4802***	5.5745***	2.7734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城市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Adj.R ²	0.0155	0.7691	0.7832
观测值	1089	1089	1089

进一步，我们更换前文使用的控制变量，选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亿元、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亿元四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结果如表 7 所示，与基准结果得到的结论相同，控制变量的选取并没有过度影响到本文的论证。

表 7 更换控制变量

变量	基准回归
YD _{it}	-9.4283**
YD _{it} ²	7.1554**
常数项	5.69185***
控制变量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Adj.R ²	0.7832
观测值	1089

4.3 进一步分析

本文以公路里程数作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代理

变量，将样本按公路里程数 50%分位数划分为两组，通过分组回归检验基础设施建设对政策沟通效应的调节机制，结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机制变量——基础设施

	<50%	>50%
	(1)	(2)
YD _{it}	1.691	-1.1405*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539	544
R ²	0.7503	0.8316

从回归结果来看，第 1 列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当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时，即便提升央地政策沟通水平，也难以有效缓解资源错配程度，这是因为边疆地区普遍存在的空间壁垒未被破除，导致政策沟通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流动方向与实际空间可达性依旧难以匹配，最终形成资源错配。而列 2 系数为-1.1405 且通过

显著性检验，意味着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政策沟通对资源错配的缓解效应显著增强，这是因为一方面，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可降低要素流动成本，使政策沟通中精准对接的跨境电商、沿边口岸等领域能有效吸引资本流入，缓解资本错配；另一方面，完善的跨区域通勤网络可减少人才外流，促进劳动力技能与政策引导的产业岗

位需求匹配,缓解劳动力错配,从而有效降低资源错配程度。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本研究以 2003-2019 年边疆地区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测算政府工作报告文本相似度衡量央地政策沟通水平,结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资源错配程度,系统探究了央地政策沟通对边疆地区资源错配程度的影响,得出以下核心结论:一,央地政策沟通与边疆地区资源错配程度呈显著正 U 型非线性关系,存在介于 0.5538-0.8681 区间内的最优政策沟通水平 0.6977,当政策沟通水平低于该阈值时,随着政策沟通强度提升,资源错配程度显著下降,而超过阈值后,过度的政策沟通会导致资源错配程度回升,这一结论经 Utest 检验、顶点两侧双线检验、更换被解释变量测算方法(TF-IDF 替代 TF)及更换控制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验证了“政策沟通水平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最优水平”的假说;其二,基础设施建设在央地政策沟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中发挥关键调节作用,相较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边疆地级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边疆地级市政策沟通对资源错配的缓解效应更显著,表明央地政策沟通可通过精准对接边疆地区基础设施需求如沿边口岸公路衔接、农村公路覆盖等,破除要素流动的空间壁垒,进而改善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的配置效率,这也为理解政策沟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内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5.2 展望

基于本研究的发现,未来相关研究可从以下维度进一步拓展:

1. 在研究视角上,可进一步细化政策沟通的内容维度,当前研究以政府工作报告整体文本相似度衡量政策沟通水平,后续可结合文本主题模型如 LDA 模型拆解政策文本的具体领域如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分析不同领域的央地政策沟通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异质性影响。

2. 在机制探索上,可进一步挖掘政策沟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其他中介路径,如分析政策沟通是否通过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区域产业协同等渠道改善资源配置,同时可引入“边境贸易活跃度”等边疆地区特有的情境变量,考察其对政策沟通效果的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 [1]季书涵,朱英明,张鑫.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6,(06):73-90.
- [2]崔书会,李光勤,豆建民.产业协同集聚的资源错配效应研究[J].统计研究,2019,36(02):76-87.
- [3]张建华,邹凤明.资源错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5,(01):122-136.
- [4]曹玉书,楼东玮.资源错配、结构变迁与中国经济转型[J].中国工业经济,2012,(10):5-18.
- [5]白俊红,刘宇英.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改善中国的资源错配[J].中国工业经济,2018,(01):60-78.
- [6]刘会政,李雪,张洋洋.外资管制放松是否有利于缓解资源错配——基于所有制视角的准自然实验[J].产经评论,2022,13(05):106-124.
- [7]孟辉,白雪洁.新兴产业的投资扩张、产品补贴与资源错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34(06):20-36.
- [8]江艇,孙鲲鹏,聂辉华.城市级别、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错配[J].管理世界,2018,34(03):38-50+77+183.
- [9]牛德林.边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意义[J].函授教育,1994(4):10-25.
- [10]李光辉,张练.新时代中国边疆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研究——基于“五大理论”的创新[J].经济纵横,2022(3):28-38+137.
- [11]韩剑,郑秋玲.政府干预如何导致地区资源错配——基于行业内和行业间错配的分解[J].中国工业经济,2014,(11):69-81.
- [12]白俊红,刘宇英.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改善中国的资源错配[J].中国工业经济,2018,(01):60-78.
- [13]刘伟.学习借鉴与跟风模仿——基于政策扩散理论的地方政府行为辨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1):34-38.
- [14]王美今,林建浩,余壮雄.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特性识别:“兄弟竞争”与“父子争议”是否并存?[J].管理世界,2010(3):22-31.
- [15]陈云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J].经济研究,2019,54(01):4-19.
- [16]钱文荣.中国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政府缺陷与用地规模过度扩张[J].经济地理,2001,(04):456-460.

- [17]倪婷婷,王跃堂.区域行政整合、要素市场化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39(11):136-156.
- [18]张莉,朱光顺,李夏洋,等.重点产业政策与地方政府的资源配置[J].中国工业经济,2017,(08):63-80.
- [19]颜德如,李过.改革开放40年来政府改革的动力转换——基于1979—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J].行政论坛,2019,26(01):5-12+2.
- [20]文宏.中国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注意力测量——基于中央政府工作报告(1954—2013)的文本分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54(02):20-26+171.
- [21]邓雪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测量——基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978-2015)的文本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5,(08):30-36.
- [22]杨君,郑雪,王韵琪.公众议程、媒体议程与政府工作报告的政策沟通过程——基于中国19个主要城市的观察[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19(06):78-88.
- [23]Ryan C, Stanley T, Nelson M. Accountability Disclosures by Queensland Local Government Councils: 1997 - 1999[J].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 Management, 2002, 18(3): 261-289. DOI: 10.1111/1468-0408.00153.
- [24]Alix R, Jean-Philippe C, S P B. Lexical shifts, substantive changes, and continuity in State of the Union discourse, 1790-2014.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112(35): 10837-44. DOI: 10.1073/pnas.1512221112.
- [25]文宏,赵晓伟.政府公共服务注意力配置与公共财政资源的投入方向选择——基于中部六省政府工作报告(2007—2012年)的文本分析[J].软科学,2015,29(06):5-9.
- [26]卢盛峰,李晓淳,卢洪友.地方政府财政治理特征研究:来自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J].财政研究,2020,(04):99-114.
- [27]刘诚,夏杰长.线上市场、数字平台与资源配置效率:价格机制与数据机制的作用[J].中国工业经济,2023,(07):84-102.
- [28]Hoberg G, Phillips G M. Text-Based Network Industries and Endogenou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1, 124(5): 1423-1465.
- [29]Lind, j. T., and H. Mehlum, 2010, "With or Without U? The Appropriate Test for a U-shaped Relationship",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2(1), 109-118.
- [30]Aghion, P., N. Bloom, R. Blundell, R. Griffith, and P. Howitt, 2005,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2), 701-728.
- [31]Swaab, R. L., M. Schaerer, E. M. Anicich, R. Ronay, and A. D. Galinsky, 2014, "The Too-Much-Talent Effect: Team interdependence Determines When More Talent Is Too Much or Not Enough",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8), 1581-1591.

作者简介:余迎一(2001.2—),男,汉族,河南驻马店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边疆经济学。